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钟敬文散文

杨哲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530094



530094

杨 哲 编

钟敬文散文

北京广播学院

赠 书

电视研究中心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钟
敬
文
散
文

扬 哲 编
钟晶晶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4.5印张 287(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8000册 定价:16.00元
ISBN 7-5043-1959-7/I·199
(京)新登字 097号

2012/5/04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

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谢大光

(按姓氏笔划为序)

常务编委 张品兴

我与散文

(代自序)

近来有些地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发函给作家，询问他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年份写的，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听说有些作家对此已经作了回答。我十分羡慕他们的好记性。就散文作品说吧，我便根本回答不了那些问题，尽管知道，能够真正回答出来，至少也是颇有趣味的事。

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散文并发表它的，我检查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从其中那些较早发表过的作品，看到所署时间为1924—1926年。这当然是可靠的。但是，在这些年份之前，我大概已经写过这类文章，不过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收进集子罢了。

“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耽爱了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就是所读的小说，也大都是文言的，如《聊斋志异》及那些时候流行的《玉梨魂》之类。大约1920年前后，我转向了。我溺爱起新文学来。既然爱读那些新文学作品和理论，自然不免要学样写作起来。记得所写的有新诗、散文，甚至还学写过诗剧，那

大约是受了郭老^①《女神》的影响吧。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又迷恋上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热心于搜集、记录歌谣、故事。

我初期写作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散文），有不少是发表在南洋一家日报的副刊上的。因为该报的总编辑是我的老师陈散尹先生。他可说是我新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恩师。他离开陆师后，到南洋去帮同乡办报，我们经常通音讯。因此我那些时期的习作，就大都在他主编的报纸上与读者见面。

话有些扯远了。我写作和发表散文虽然开始于二十年代前期，但是比较集中心力去从事的，却在1928年秋天，我从广州转到杭州教书之后的那段时间。1929—1930年间，我印行了两本散文集——《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其实，那些时期，我还出版了一册谈论文艺的集子——《柳花集》。从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气息和风调看，也是絮语散文性的。记得阿英同志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史料索引时，就把它算作我的散文创作集之一。这可说是我散文写作的高峰时期，虽然它并不就是我这方面创作质量的比较成熟时期。

这些时期，我散文中所写过的、比较突出的对象是山水、草木等自然景物。这除了那时个人的思想等原因之外，客观环境是很有关系的。我正住在西子湖滨的杭州，而且有些时候简直就住到湖上去。自然，文集中还有写人物、评世相、谈文艺，以及直接抒写当时个人情怀的篇章。这些可说是《荔枝小品》

① 即郭沫若同志。

内容的继续、扩大乃至至于深化(部分的)吧。

我那些散文,在风格上大都比较幽静、清淡。这种风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荔枝小品》付印时期,朋友们的看法和后来一些评论家的意见,大都认为是受了新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作家的影响,或者属于他们一个文派。这种意见我自己也是相当承认的。因为在那些时期,我的确诵读过周启明^①、叶绍钧、谢冰心,以及俞平伯等人的文章或专集(如《自己的园地》、《剑鞘》等),有的还使我一时非常倾心。

但是,就在我初期的散文中,风格也不是很单纯的。它所受的同时代作者(包括年岁比我长的前辈)的影响也并不是单一的。稍微具体点说,在我当时的散文中,除了那些比较显眼的闲适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是批评性的、随感录(后来所谓“杂文”)式的。它更具有时代的气息。而对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却是《语丝》里的另一类文章,另一些前辈。只是这类文章在我前期散文中并没有形成主要特色,因而被批评者所忽略了。

在我前期散文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内容到风格上都呈现着受过古典文学(特别是宋、明才子派的散文小品)熏陶的痕迹。这种痕迹,在《荔枝小品》中已经出现,到杭州时期的作品就更为显露了。

这种特点的形成,跟我当时的世界观和所写过的题材,当然都有相当关系;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文学上的爱好和修养。我从小就喜欢古代文学。《古文释义》、《唐诗三百

① 即周作人。

首》等古典文学初级读本，不消说，早就念得烂熟了。我特别爱读苏东坡的小品文字，见了就不肯释手。他的那部从日本版本再翻印过来的《苏轼小品》，现在还经常放在我睡床前头的书柜上。我偶而翻翻它，总觉得有些会心（当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了），同时也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它对我早期散文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有关的旧事。当我第一次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时期（1927—1928），正好顾颉刚从北京、上海等地为学校研究所购回一大批旧书。其中，《皇明十六家小品》我看了非常高兴。当时还曾经选录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做为中大预科的国文教材。这部书对我无疑也是有影响的。到了杭州以后，我又爱读张岱的《西湖梦寻》、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四时幽赏录》等。这些也是不能不在我早期的散文上留下飞鸿的爪印的。

我前期散文，受了古典文学的影响，不但痕迹显然，而且所以造成影响的原因，也是蛛丝马迹，历历可寻的。可惜，过去批评我的散文的同志们，大都着重思想的检查（对作品内容情思正确的分析、评价，当然是必要的），却没有用多少心思去顾及其它方面的考察，所以把这种特点和它的形成原因都忽视了。这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成功的文艺批评家，比较丰富的文学素养、宽阔的视野和细心的观察能力，是何等重要！

社会不断变化着，人的思想和学艺也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三十年代开始以后，我的学艺的方向，集中于民间文艺和

民俗的搜集、研究，很少再写作那原来对之兴致勃勃的散文。这个过程仿佛是从高峰堕落到深谷的样子。自然，此后在阅读上和广义散文（如论文、序跋等）的写作的某些方面，我并没有和散文小品完全断绝了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提起来就使人难过的事情。1936年夏，我在日本进修告一段落，将要回国之前，利用那段空隙时间，以散文札记的形式陆续写了一部稿子。目的是记录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以为这段住在国外生活的纪念。它虽然主要是文献性的，但是，无疑体现了我那时期对散文的看法和新的修养。可惜由于日本侵略军迫近杭州时，我带病离开那里，那册还未排成铅字的散文稿本，跟其它的一些书籍，都在罪恶的炮火下同成为灰烬了。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损失！

战争改变了一切。象我这样一个长期蹲在书斋里的学徒也不能在炮声、轰炸声中安住下去了。抗战第二年七八月间，我辞去江苏教育学院（它是从无锡迁到桂林的）的教职，从桂林到广东前线（第四战区）。不久由广州迁居粤北。1940年春间，当地驻军击退了向北进犯的敌人，报上称为“粤北大捷”。战区军威民心为之一振。接着，我和杨晦、黄药眠等作家，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从化一带前线慰劳军民，并收集资料，拟写作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以鼓励军民抗战情绪。我分担写作的是散文、报告。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行脚（前线交通工具困难，大部分的路程真是靠两条腿行走的），在秋天里，我们回到了曲江（当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我在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

《新军》杂志之余，陆续写成了几篇报告（《银盏坳》、《残破的东洞》及《抗日老英雄——萧阿彬》等）。原想辑成个专集出版。可是战时印刷发行条件很困难，结果没有成功。这些战地报告，当时一部分被收入《良口之战》（战地报告文学集），其它，后来大都陆续发表在《文艺春秋》、《自由世界》等刊物上。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报告文学之笔。这在我学艺活动上是一个飞跃！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我的确是生疏的，尽管我曾经很认真地读过《秘密的中国》、《震撼世界的十月》等名著。但我当时写作这些报告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因此，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民族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着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呢？跟这种后期散文比较起来，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从这点说，我的几篇报告散文，多少是值得自己珍惜的。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全国人民都希望从此

能过上安定的日子。但是，国民党的好战派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悍然挑起内战。次年，他们下了所谓“讨伐令”。从此，不但要在整个大陆上歼灭广大人民革命的军队和政权，连对于国民党区内的那些进步的人物和文化机关也要进行扫荡了。1947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当局接受了“乱命”，解除了我和其他几位进步教授的聘约。我于7月末，考完该校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毕业试之后，便化装逃往香港。接着在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

这时期，香港，这个中国南端的自由港，却成了由大陆移来的各民主党派总部和许多进步人士的聚集地和活动地。许多争民主、反内战的政治、文化集会不断在那里举行。进步的文化刊物也在书摊上出现了。它们有的是从国内移来的，如《群众周刊》、《文艺生活》等。也有的是在那里新创办的，如《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能仅仅做一个文学教师，同时必须做一个文化的、文艺的战士。我们大力提倡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应用到南中国的特殊方言区（广东），从而教育、鼓舞更多人民为当时的解放战争而奋力。此外，为了满足主客观的需要，我还写作一些文艺评论和散文。后者如《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人民的歌手》、《忆达夫先生》及《悼朱佩弦先生》等。这些散文，既是抒情的，也是意识到它的社会责任的。

这时期我所写的散文数量并不多。从思想内容看，基本上是抗日时期报告散文的继续和延伸。在文章风格上，也跟那些报告相似，一般比较谨严、精炼。它大大矫正了我早期散文那

些散漫、粗糙的毛病。这种风格大体上延续到解放后的写作中。

象上文所说，我过去所写的散文，有前后期之分。1930年，大约可以说是一个界石。后期的散文，变化是相当大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当然是个人生活实践和世界观的变化。中日战争，是民族的大劫难，是一座火的地狱。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我的思想、世界观，主要就是在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机会的。作为逃亡者寄居香港时，是这种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这些变动使我后期散文有了新面貌和新精神是不用说的。但是，这不能说是那原因的全部。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它不是主要的一面。

1930年以后，我除了把大部分的精力集注于学术的研究之外，也不断诵读着国内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象罗曼·罗兰、法朗士等的散文，我是反复诵读、细细品味过来的。特别是罗兰，他的思想和艺术，在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成了我精神的血肉。其他欧美和日本散文名家的作品，我也曾耽读过不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生涯是相当坎坷的。我是一个喜欢蓄积书籍而又无力保卫住它的人。藏书失了又补，补了又失，这样已经好几次。有许多心爱的书，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所幸在那些仅存的旧书里，还保存着《易匹鸠尔之园》、《超越混战》、《斗争十五年》、《亨利·来克拉夫的手记》，以及《做梦的人》等残旧的书册。它们曾经是我心灵的伙伴，现在也还不失其为老朋友。我要卫护它们，直到我生命存在的最后时刻。

对于那些名家的作品，我虽然那么耽爱，却没有存心去模仿它们。因为我知道这模仿的结果将是什么。可是长久耳濡目染，自然使我自己的写作变了样，在风貌上它不可能不起变化。这就是我的散文在前后期有着相当不同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

华北解放了，我从香港来到北京。接着全国也解放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文化工作者，我正以无比欢快的心情，忙于新的教学工作，忙于新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散文写作一般不免疏远了（除了比较偶然的机，如1953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5周年索稿，我特为写了那篇《一阵春雷》）。

1956年夏，全国文联，组织了作家西北地区参观团，我和冯至、朱光潜、常任侠等同志都参加了。我决心在学习、考察的同时，收集资料，回京后写一本散文游记集。8月末回到北京，曾经小住西山碧云寺（当时是文联的休养所）。在那里，我吟味所收资料和见闻回忆，开始了我的散文写作。已经写出了《玉门之夜》、《访问韩起祥》等底稿。但是，那时学校工作忙，我除了教学外又兼些行政职务，只得于九十月间匆匆回城了。计划中的西北散记，始终没有续写，连那已经写出的一些底稿，也没有整理出来。倒是那回山居时的副产品《碧云寺的秋色》、《夜游芦沟桥》等，不但早已在报上发表，有的直到近来还被选入散文集子在重新流传。

这是我散文写作生活上值得回忆的一段插曲吧。

从1957年至1976年的一段时期中，我主要的“文艺创作”，是撰写“思想检讨”、“交代亲友关系”，以及“劳动日记”等。这些东西，如果现在从某种角度去看，也许不无一种“史料”价值；可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只是使人啼笑不得的一堆垃圾而已。

“四人帮”终于倒台了。全国人民的生机恢复了。民族的思想、文化从冰冻里夺回了春天。我以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而苦斗着。我的专业活动几乎占去了我所能有的时间和精力。象写作散文这样的“闲事业”，的确是排不上队了，尽管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它。但是，天下间的事情总不是那么绝对的。在那样为专业工作尽瘁的日子中，却仍有迫着我不能不动笔去写点散文的时候。比如，一天早上，一位相识六十年、历尽人间艰险的老朋友倒下了。在听了凶讯之后，我能安然无动于衷吗？又如，有些文艺界的老战士大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却在“文革”中被摧残致死。现在，大家纪念他们，为他们洗冤摆好，我能默然不拈笔杆么？……因此，近年来，我写了几篇哀悼、回忆的散文，如《我们不能忘记的人》、《悼聂绀弩》、《纪念一位大众文学作家——老舍先生》等。此外，我还写了一篇《成都去来》。它是我八十三岁入蜀，自成都回京后写的。这怕是我三十多年仅有一篇游记文章了。

解放后，对散文作品虽然没有绝笔，但所写实在不多。从思想、风格说，它跟解放前后期的作品没有太大区别。自然，所写的对象有些不同；但作为一种创作，却没有什麼跃进的地

方。如果一定要找出些长处或异点，似乎近年来所写的有些文章，情思较深挚，而风格也较为施展自如，少些拘束罢了。

时光真如打闪。从二十年代前期开始学习散文小品，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它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许多年来，为了人世间的各种因缘，断断续续地总算是在写作着（其中一个时期，对它还是那么亲热和眷恋）。现在回头看来，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多少抒发了各个时期个人的思想、情趣，也没有忘记对民族、社会命运的关心（特别是后期的作品）；艺术上，也随着时间的向前而有些进境；但是，严格说来，我的散文，无论质或量都是比较薄弱的。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前辈和朋友，在这方面曾经给予我以鼓励和祝愿。对于他们，我现在只能吟诵自己数年前所作的一首七绝的末句以谢罪。那句诗就是——

“眼中人愧负先生！”

时代在前进，散文小品的创作也在前进。今天，我们文艺界已经有不少青壮年同志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作为一个不争气的先行者，只有向他们鼓掌，只有望着他们的背影致以虔诚的祝福。希望他们能够远远超越我们这一辈而绝尘狂奔！

附记——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委托北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蔡清富同志编辑我的散文选集。清富同志希望我对自己的散文说几句话。记得前些时候，《人民日报》第八版开辟了一个“我与散文”专栏，我不但喜欢地读了那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

的文章,而且欣赏那个栏目定得好。自己也跃跃欲试,却终于没有执笔。现在,利用病余时间,匆匆赶成这篇小稿,一方面酬答清富同志的好意,另一方面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钟敬文

1988年4月中旬,

于北京友谊医院病房

目 录

我与散文(代自序)·····	(1)
残荷·····	(1)
花的故事·····	(4)
游龙井·····	(7)
重阳节游灵隐·····	(15)
雨讯·····	(20)
海滨·····	(25)
海行日述·····	(28)
金陵记游·····	(52)
成都去来·····	(67)
旧事一零·····	(72)
临海的旅店上·····	(75)
潜初去后·····	(79)